

中華文化出版社

本報向社會局登記

星期評論

劉英士主幹 第九期 高良佐編輯

觀望有其限度

國際新聞社一月二日莫斯科電：史大林致我國領袖報，警告國人必須準備應付一切非常事變，核其要義，無異主張於事實上將蘇聯置於動員狀態之下。史大林函內稱：國際局勢極其複雜，其演變之結果，已使國外之危機日益加深。我人今日有橫遭軍事壓制之危險；我人決不應聽任強暴之敵人有乘我不備施行突擊之機會云。又路透社三日紐約電：紐約時報據瑞士伯爾尼消息，蘇聯軍隊現已集結於斯德哥爾摩北岸薩夫奧斯德爾之間。此訊可以表示蘇聯預料德國將開始進攻，並謀攻塞瓦斯托波爾波羅佔領區之斯堪尼亞拉佛云。

此二消息皆非塔斯社所發，而且轉譯太多，恐不十分可靠。但據我們的看法，自從蘇聯軍隊獲勝以後，國際局勢早已明顯至於無可增進的程度，而這一戰世界大戰的最後餘音，大致亦早決定於去年十一月五日美國大選之結果。除非蘇聯準備犧牲一切它在國際上所應享有的虛榮與實權，並不圖於未來和會中間以一勝利者之資格出席發言，那麼，它的態度之表明，實屬不容再諱。

我們始終相信蘇聯是有雄厚的自衛能力的，正如中國之有雄厚的自衛能力。但以下述兩種原因，我們却不敢望蘇聯之對這次戰爭，能夠早日加入其所願意選擇的方面：第一，在沙皇時代，俄國素以文化落伍政治腐敗著稱，自十月革命迄今，計則不滿二十五年，建設維艱努力，計劃雖多實現，然與西方其他列強比較起來，無論是在精神或物質方面，終不免相形見絀；第二，它和德國之間，不但沒有一個大西洋來往之阻隔，甚且沒有一個英吉利海峽，如果它也學著美蘇那樣的口口如二，就得提防善用閃電戰者予以襲擊，伸之措手不及。明白了這點背景，我們就很容易瞭解近十年來蘇聯對於動盪的國際局勢，為什麼老是堅持和平政策。這政策實在高妙，比較第三國際屬下許多發言人或代有人所常強調指出的更為高妙。依據他們的說法，蘇聯的和平政策是因愛護和平或榮兒帝國主義者之自相殘殺而形成的，其基礎是種心理態度。依據我們的說法，蘇聯的和平政策是種「卡莊子刺虎」式的政策。兩虎相鬥，不妨觀望，待其一死一傷而後拔刀向前，兩虎俱得，勇之至也！這政策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那實力的轉量上面，比較合乎唯物史觀。

現在的局勢，稍有異於卡莊子所見的局勢：第一，交戰國究比老虎聰明一些；第二，戰敗國若能徹底改變政體，表示它有願與戰勝國合作之誠意，即不便以死虎視之；第三，既富且強的美國也烈刺虎，就是有了兩個卡莊子。在此局面之下，「漁翁政策」比較更適用些——漁翁是不等待鱉蚌俱死成一死一傷而後下手下的。

爲了和平的早日出現，爲了蘇聯本身的利益，我們希望它勿觀望到底。(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星期評論社出版 濟南

南京圖書館藏

空中反攻有希望了

路透社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紐約電，前鋒論據由華盛頓權威方面獲得消息稱：美國將至少以四百架新式轟炸機，及轟炸機若干架，交與中國政府，其中並有波音式空中堡壘六架。聞此項決定係由中國代表團領袖毛邦初將軍與美政府官員會談之結果云。

這消息已經中央社為之發表，一定是很可靠。今年夏季是那一方面發聲報！這六架空中堡壘，要是名副其實的話，宜可裝載幾百顆大炸彈到神戶大阪一帶去襲擊敵國的兵工廠和紡織廠了。毛邦初將軍不為歡子，倘若他只有預備「適時升空迎戰」的話，這這六架空中堡壘何用？整整盼望了三年有半，中國空軍亦將有其揚眉吐氣之一日，我們同感興奮之極！

傀儡也分等級

中央社維漢三日合衆電：「維漢政府昨晚否認外傳法國已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之說。查該國保德方之無線電通訊社所傳，而由美國報紙予以轉載者。法國當局對此加以評論云：此種屬無關之報道。法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宣戰之時即已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自此以後，兩國外交關係迄未恢復。德法兩國目下之關係，為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關係，征服者得依照軍事上傳統之習慣與國際公法，享受一切戰利品云。」

我們希望大家頂禮讚揚。維漢政府以被征服者自居，表示其對德方之一切讓步，皆非

出於自願，而似弱女之被敵寇強姦。如果你能拿出一把手槍來送給這弱女，她就不至於毫無抵抗地被人強姦。

基於此種觀點，我們對於所謂汪偽的又加深了一層認識。人家的傀儡政府多麼有出息！汪逆先銘曾自比貝當，現在如何？一張嘴兩片皮，順來倒去總有理，他或要笑貝當不徹底！

原則與技術

有位老先生問我：「你們新派人寫的文章，委實不易看懂。譬如對於某一件事，你們常說在原則上如何如何，在技術上如何如何，究竟何謂原則，何謂技術？」我指着下面一段新聞給他看：

美國國際新聞社一月二日羅馬電：據義官方發表聲明稱，德元首希特勒以其一部空軍加入義方，由今日起受義空軍參謀總長布里克之指揮。據悉，德飛機已有數架抵此。[這裏面沒有講到原則與技術]，他說。我的答覆是：「有的，在原則上言，墨索里尼已向希特勒乞援；在技術上言，德空軍是在義方指揮之下作戰。」

老先生總是老先生，大搖其頭地說：「說謊也，說謊也！」他似乎懂了一半。

五十步何如百步

中央社美國國際新聞社去年十二月卅一日華盛頓電，據官方消息：美國政府現在考慮對日絲入口徵收「關稅」百分之五十。政府高級官吏

稱：因日本在中國淪陷區佔領美國商業之結果，故近數月來政府領袖時常考慮此事。絲為日本經濟生命之血，現時尚可自由輸入美國，如徵收關稅百分之五十，則日本經濟之致命打擊云。雖則對日暴日，「關稅」這個名詞究竟不大好聽。我們以為與其用這刺耳的名詞，不如乾脆宣佈禁止日絲進口。日本人最會走私；關稅之結果或將逼令他們專走私路！反正是已翻臉了，五十步何如百步？

國民小學復活

成都電話：教育廳以實施新縣制，普及國民教育，必須興辦若干國民小學，乃決將舊縣小學外之各省立小學收歸所在地之國民小學。具體實施辦法刻正商討中。

現在三十五歲左右的人似乎都會進過「國民小學」，可惜舊牌子都已丟掉。在未見到具體的實施辦法以前，我們只希望主持改制的人勿墮落入所謂「唯名主義」的窠臼。

慢郵代電

關於本刊第三期第八頁所載啟事，經第七期代電催促之後，連日接獲遠近讀者來函，介紹湖北樊城楊春華、明二君，黃鼓王宗煥君，南漳范伯駿君，江西奉新唐廣源君，山西余勝源君，河南鄭州李子芳君，新寧李師甫君，湖南湘陰陶輝君，四川奉節鄧凱君暨江西都昌羅緒英君，共十一人。連七期代電所已發表之稟君在內，合計十二名。本案現已了結。

我們的經濟行政何以時常改制

陳之邁

近數年來，我國因在草訂憲法，全國論字而能看報讀書的人似乎都在受着「憲法教育」，大家對於憲法好像都得到了一些常識，在茶餘酒後津津樂道。最近因戰時經濟漸次擠入富前的重要問題之林，軍事外交幾乎並駕齊驅，尤其是構成經濟問題之核心的物價問題，對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正在發生着決定的影響，於是漸漸不談「物價」而講「精神」的士大夫也好像有些感到落伍，忽然談起經濟來了。在這不斷的「談」中，大家似乎都獲得了一些經濟常識，雖則根本沒有常識的話也還可以時常聽到。

因為我是注意政治機構而近來又在讀「上時常與政治機構的調整發生關係的人」，所以現在有些談經濟的人便常和我談到經濟行政機構的問題。果然，近年以來，也可說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政府機構變動最劇烈的就是經濟行政機構。以純粹的行政機構而言，從前有農商部與工商部，後來併為實業部。此外又有先隸屬於行政院而後改為直屬於國民政府的建設委員會。同它並存的又有全國經濟委員會。抗戰初興，軍事委員會之下也有主管經濟行政的第三部及第四部。到了二十七年，又產生了一個經濟部，將許多機構併了，特別是建設委員會與全國經濟委員會。這似乎是由分散而集中了，凡屬行政效率的人莫不願首稱慶，但不久便又成立了農林部與水利委員會，接着又添設了全國糧食管理局；七中全会又決定了設立經濟作戰部，後聞改名為國防經濟部，近又決定稱爲物資總監部。關於國外貿易，軍事委員會原有各種機構，後來歸併到了財政部；而近來更不斷的有人主張在行政院下設一貿易部；而財政部的貿易委員會之應否歸入物資總監部，也有人在從事研究。關於交通，原來只有交通部，後來分出了一個鐵道部，二十七年度組織又止剩了交通部，近來又有運輸統制局。這些零碎的事實，真使局外人感覺到經濟行政的機構，大有「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勢。

不免要問這是什麼原因。本來在外國，特別是在所謂內閣制的國家，行政機構之增設裁併是極普通的事情，而在我國則是一件大事；「法律修訂問題」，有主持人一問題，有權權劃分問題，還有那個個人是關心而其實或不重要的所謂人事問題。所以在中國變動一次機構，要費一番極端繁複的手續，又要調動大批人員，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講行政制度的理論家對於政府機關的設置，認定是有一套法則的，這背了這套法則便「不合理」，結果也必缺乏效率。負有實際責任的人也常說，調整一次機構，便得換個招牌，重印公文紙張，更張人事，辦理移交，看八行書，寫抱歉信，非經三四個月不能切實辦事，時間既屬浪費，物力也有損失。這些事情，不是主張調整的最高權力機關所不深切體認的，因為吃苦受累的大都是高級長官。但是他們仍極主張增設或裁併，一次一次的改組。這是什麼緣故呢？更進一步地問：政府機關甚多，為什麼別的院會不大改組，而獨行政院與軍事委員會時常改制？為什麼改的對象不常在內外交方面，而却常在經濟行政的機構上呢？這個問題固不是容易解答的，但我們也不妨試試看。

簡單的說來，我們以為似有兩個主要的理由。第一，中國今日正在現代化的大道上飛奔疾馳；所謂現代化之二個方面，便是竭力的注意經濟。在抗戰初期，外交與軍事比較重要，所以士大夫於喜歡談論的是一「國際形勢與抗戰前途」。戰事愈到後來，經濟的因素愈感重要，差不多是具決定的力量，所以全國上下的注意力便都集中到經濟一點，於是經濟行政便變成內政的中心，而人人都有他的意見了。等到經濟壓力真的影響到了每一個人的食衣住行上面，他們的注意力便到了頂點。於是軍情激越，都要希望政府去在經濟設備方面加倍努力，而條陳、建議、方案和計劃等等也是絡繹不絕地提出，請求政府去辦這個，注意那個。有的人要設立農林部；有的人要設主管工業的事

部；有的人主張多開荒地以增生產，故欲設一專管墾務的機關；有的人以爲疏濬河流既可灌溉農田，又可增加動力，更利便交通，打破敵人的封鎖，故又督促政府成立一個水利委員會或水利部。中國人凡有一種主張，便想設立一個專管的執行機關，最好是能自成一個系統，不受牽制，由中央而省市縣政府，下至區署鄉鎮公所保辦公處，形成「一條線」制。所以一個縣長可以兼到三十多種職務。最近的合作行政機構便是一個絕好的實例。所有人員都由上面經過「訓練」，一直委派下去，自己構成一個系統，不受省政府主席或縣長的控制（名義上總是要其「指揮」，其實很少能夠聽命，因爲省主席或縣長對之根本沒有任免獎懲之權），多少有些目前主計制度的「超然」精神。因爲近來被人認爲可以幫助抗戰建國的事情太多，所以機關也就跟着加多，系統也就跟着複雜起來。這樣演變的結果，使得政府的功能漸漸地起了分化作用。各方面都在獨立工作，便不免發生重複。彼此的範圍都是越擴越大，便不免界限混淆。到了這個時候，政府便想設法來調整，使之合理化。通常所用的方法，不外以下兩種：（一）設立一個聯繫機關，就是多添一個機關，（二）根本加以改革，我併現有機關，使之一元化。但若採取第二個辦法時，不久又將回復到那從前的局面了，因爲主張「一條線」者又必設法分化它，重復複雜的局面另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這雖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但因經濟行政是爲人人所最關切，故其機構之分合，尤屬繁瑣。

同時，經濟這一部門，最近最受我國士大夫的注意，故其所持理論大都不中不西。然而機構之設立，爲的是辦事，辦事須憑一個成熟的指導理論進行。現在理論尚未確定，則彼依着理論以辦事的機構自難成爲定形，而必時常變更。也許有人要說，民生主義便是我們最高的指導原則，爲什麼不可據此以建立理論呢？這話一點不錯，我們確實是應該在這一方面努力。但在一個廣泛的原則之下，想對於某一種具體的事實確定一種具體不移的政策，却是困難的。直到今天，我們的朝野人士還有人主張亞丹漸密的自由或放任主義的。有人以爲民生主義既不主張廢棄私產制度，便不應爲，而且不備，實行聯邦的計

劃統制經濟。有人（很少）以爲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一面維護私有財產，一面實行統制政策，最適合於民生主義。有人以爲與其說是國家社會主義，不如說是羅斯福的「新政」——即所謂管理經濟。更有人主張要把一切收歸國有，不問其叫什麼政策，或稱什麼名義。

爲欲證明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起見，我們最好是以前日的糧食問題爲例。有人解釋近來的糧價上漲是依「供求規律」，因爲四川今年的收成不如去年，更不如前年，宜昌失守以後湘米不能入川，所以川米的價格不得不以供不應求而暴漲不已，故放平抑米價，唯一的方法是在發展生產與便利運輸；糧食管理之實施，無濟於事。有人則走另一極端，而說平抑米價的方法，只有實行蘇聯式的公賣制度。如行此制則管理糧食的各級機構，至少要比現在大出十倍，才能應付裕如。在這兩個極端當中，自有幾十個程度不同的折衷辦法：或者主張規定法價（法價險者又分撥派，除米價外，尚有人主張規定日用必需品價，工價，甚至烟價）；或者主張「刑罰用軍典」，採取所謂「借債」辦法；或者主張調查農家的收穫與消耗，勒令將其餘糧報報；或者主張組織經濟警察，切實下鄉檢查；或者主張限制紙幣發行，並將行政經費減低；或者主張政府寬籌經費，用以平價購銷；或者主張吸收游資，以免作祟。諸如此類，都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殊不敢說究竟那一個主張適合於民生主義，那一個主張不適合於民生主義。至少作此種種主張的人，無一不是自稱根據三民主義，而民生主義對於目前的糧食問題亦確不會有一具體的明白指示。但這僅是「一個」例子，此外當然還有不勝枚舉的例子。一言以蔽之，政府在政策方面，雖然已經大體決定，但不是沒有部分更改的可能。在此徘徊瞻顧之際，究竟應有怎樣的機構才行，確是一個絕大的疑問。這是經濟行政機構所以永遠受人批評，而不得不時常改變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本文中，我既沒有貢獻什麼理論，也沒有提出什麼方案。我的目的祇在解釋一個當前現象的起因。我認爲「對症發藥」是句頗摸不確的格言；我們應先認清症候而後發藥。在談調整經濟行政的機構以前，時宜對於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似尚需要加深一層的認識！

法幣應否聽其流往淪陷區域之商榷

于啓民

關於法幣之應否聽其流往淪陷區域，作者以為這確不是一個質然使
得肯定答覆的問題。因為單以貨幣戰爭而論，敵我雙方的攻守戰略就
難免各處永遠一樣；而且在長期抗戰局面之下，淪陷區域的實際情形也
隨時無地不在變化當中。何況貨幣作戰乃是整個經濟作戰中的一環，
我們自不能漠視全局，而專求那貨幣一方面的便利；而且每一政策之真
實結果，似也沒有什麼絕對的利害可言，故必須權其輕重，審慎抉擇。
去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公報發表一篇有關法幣攻守戰略的經濟座談
會紀錄，作者於爭得辯論之餘，心緒覺得是很興奮。因為與會諸公都
是專家或先進，並且有幾位已在淪陷區域擔任行政工作，他們如根據事實，
發言高論，一定要比那些空子更加透徹。不過單就作者個人來講，始終
對這問題持有一種不同的見解，茲願將其一得，以向當世明公請教。

傅明立場出見，作者請先撮述個人所持反對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
之重要論據如下：

(一) 在現代戰爭中間，凡係參戰國家，只要聽一顧到經濟作戰，
而復願將自己正貨流入危險地帶，以與敵人利用之可能者，則據最
見所及，絕少前例。

(二) 前年歐戰爆發後不滿四月，英政府便割香港為非英鎊區域。
彼照當時各方面的解釋，是說港幣在華南流通者甚多，英政府為防敵人
之口幣幣使鎊鎊起見，所以採取了這種措施。

(三) 去夏法國屈伏以後，英政府又令凡在國外流通的鎊券，一律
發照規定期限，運到倫敦集中兌換。這是因為法比等國以前曾與英
國合作，存有鎊券很多，英政府恐其被敵國利用而有效利用。夫以英
國那樣雄厚的實力，還要急謀改圖其被敵利用的本國貨幣，則我們
對於當前法幣的應採政策，似無好處。

(四) 就抗戰對策而言，大多數的事情幾乎毋庸研究它們的理由，
只須記住一個原則便夠，那就是凡係敵人所深惡的事務，差不多都會
於我有害；反之，只要是敵人所深惡的，自然也多於我有利。抗戰以
來，敵人在表面上雖於禁止法幣流通，然在華中則不但偽財政部長
周道佛海會有不禁法幣之宣言，且據多數情報，甚至於連偽華敵商也
喜歡法幣，不予排斥。實際上，偽聯銀券既與華興偽鈔互相通用，那
麼，華北方面單獨禁用法幣的作用，如以整個淪陷區域的立場來看，也就
幾乎不存在了。我們現在姑且不問敵偽方面為什麼在華北華中採行分
別政策，但就大部分的事實來說，敵偽雙方之都喜歡取得法幣，則是無
疑義的。茲若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豈不就是正投敵偽之所好？
(五) 在作戰期間，就是侵略者在其佔領區內，亦尚另發鈔票，避
免使用本國正貨；這也不僅日本一國為然。何以被侵略者反能將所願
惡，聽其正貨流入淪陷區域去？

(六) 論者或謂敵人在淪陷區內，既然強迫着使用一文不值的軍用
票和偽鈔券，則我方為爭取淪陷區內的貨幣支配權起見，正可以這用
棄舊的法幣來予以致命打擊。殊不知「兵對兵，將對將」是搏鬥中的
正常狀態；軍用票與偽鈔之類只是敵方的小卒，而法幣則為我方主帥，
萬一主帥而為賊兵所俘，豈非危及全局乎？這道理，雖然是在貨幣學
上不見經傳，但我總覺除非法幣確能歸於粉碎偽鈔之後，仍有擊毀敵國
正貨的充分力量，則此「帥不離位」的作戰原則，即在貨幣戰中，也是
可以參酌應用的。

以上為作者個人不主張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的扼要理由。以下
再就座談會紀錄中所舉的論據，按照原列次序，提出質疑：

(一) 所謂後方物資不足，增產不易，唯有儘量便利法幣之流出，

接近淪陷區域收購物資這一問題，實際上是含有若干細目

討論的——

(甲) 從接近戰區或淪陷區域收購物資的主要關鍵，究竟是需調取購機構的問題呢，抑或是「唯有儘量」便利法幣之流出，始可以辦的單純的貨幣問題呢？我們勿庸諱言在淪陷區域的收購工作，還沒有達到預期的成績；我們更堅決相信，若果粉粹敵人的「以戰養戰」，也是急需加緊採購淪陷區域的物資。但據作者個人意見，這却是大部分與收購機構本身的健全與否有着決定的關係。譬如說，收購系統如不能普遍深入，直接和分散各處的生產者發生關係，則上層的收價雖高，中間的剝削仍大，於是生產者爲顧全血本計，有時便不免要走向有國家立場的路上去了。其次，交通運送之困難，統制力量之薄弱，以及民衆意識之平淡等等，究應如何改進或加強，恐怕也都比那貨幣流動更爲重要。試以江浙的絲織而論，現據金融商業報載，敵偽的標價雖然較低，所用的貨幣雖然較雜，但却能以橫力阻撓第三國商人，藉以壟斷絲織貿易；這便是個最明顯的例子。

(乙) 我們無妨退後一步，姑認收購淪陷區域的物資確是一個單純的貨幣問題。那末，第一，在我們這一方面，除去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貨幣可以利用呢？不用說，毫無是有的。因爲各省仍有省銀行之存在，而中央又已准許省銀行發鈔。若說當地籌碼感覺不足，則亦僅須設法以俾各省銀行增發省鈔就成。第二，在敵偽那一方面，法幣既流入了淪陷區域，自然是要落到他們的手裏，因此，我們固然可以對那裏去利用法幣來收購物資，但他們不也可以就地利用法幣來收購嗎？這是說，雙方的工具大致相同，誰敢永遠確保我們一定能夠佔法幣的優越購買能力？

(丙) 我們如真欲以俾方物資缺乏爲藉口，亦須先弄清楚究竟缺乏那些東西，並且缺乏至於什麼程度。同時又得考慮淪陷區域所能供給後方的有那些物品，並能供給至於什麼程度。因爲這些情形的明瞭，不僅能使我們決定戰時進出口貿易的統制政策，且還能使我們決定戰時進出口貿易的正確路線。譬如說，後方的棉製品正在飛漲，因此有人

主張到那淪陷區域去收購棉花。但是棉製品的飛漲，是否僅爲單純的幣幣關係？這姑假定它是這樣，那仍須得進一步去研究它的缺乏，在這抗戰全局中間，是否已經達到了和其他更重要的物品一樣的程度。倘若其他的抗戰必需品僅能支持一年，而棉製品之缺乏，即使再過兩年也不至使我們凍死，那末，很顯然的，在兩年以內，即便棉製品賣到天上，我們也應禁止它的進口，蓋必如此，才能集中有限的實力，以去獲得其他抗戰必需品的充分補給。其次，法幣的購買力是可活用的，因之，原來想購買棉花的法幣，有被臨時變更用途之虞；這也是難於防範的。

總之，這都是與前項論據互有關連的事情，作者所說的各種假定，也更其是隨時可能發生的流弊。因此，我對所謂「唯有儘量」便利法幣之流出，以便採購物資云云，不得不暫持一種保留的態度。

(二) 要使法幣去與敵偽票券爭取淪陷區域的流通地盤，這首先爲軍事政治的動員問題。按照實際情形，凡是敵偽所能控制而又禁止法幣流通的淪陷區域，敵偽鈔券的流通自然比較廣泛；反之，只要是在我們軍政力量所能支配的遊擊戰區，敵偽鈔券就不易見到。至在自由市場上面，則所謂「劣幣壓倒優幣」這一原理，乃是鐵一般的律則，雖也不易舉出相反的事實。因此，除非能有充分的理由來證明法幣之信用反而不如敵偽鈔券，那末，我們即使聽任法幣流入淪陷區域去，而欲求其能在自由市場上與敵偽鈔券爭奪「流通」地盤，恐怕也不見得能有想像的成績。

(三) 談到「資金」逃避問題，作者以爲最低限度，如聽法幣儘量流入淪陷區域去，總比禁止法幣流入淪陷區域是方便得多。不錯，法幣不一定就是資本；但在現代商品世界，因爲法幣可以購買一切，所以誰也不便否認它有隨時隨地變而爲資本的可能。譬如說，今有一位投資者於重慶某貿易公司的股東，因爲某種關係而將股票售出，帶着法幣到淪陷區域去，即令他在淪陷區域內並未另作生意，然而即此以止，站在重慶一地的資本總額之立場來看，究竟算不算資本逃避？再譬如有人原有「一束法幣，在重慶時是鎖在箱子裏面，並未動用，現因法幣解禁，便把

據付到淪陷區去，此後更以滬東法幣，營運淪陷區內的生產，致獲鉅利，換言之，他的法幣是在淪陷區內發生了資本的作用——算不算這是資本逃避？假定此人更在上海有些外匯投機，或者放債取利，這又是資本逃避？何況除此而外，他還可以手中的法幣來替以人管理物資，成兌換為美金，存在外國銀行，這些又是不算資本逃避？如果我們的政府禁止法幣流往淪陷區域，上述現象也許比較不容易發生吧！我們固不否認即在禁止法幣任意流出的情形之下，資金亦非不可逃避，而法幣的解禁，總不能不說是給資金逃避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四) 外匯既有自由市場，淪陷區既有法幣流通，則所謂「敵偽不奪取我外匯基金」的理由，便很難於成立。過去禁止法幣流往淪陷區域之時，對於敵偽的套匯，固能完全防止，但如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則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敵偽所能套取的外匯定較以前為多。而流入淪陷區域的法幣愈多，敵偽所能獲得的法幣亦必愈多；他們拿了更多的法幣，自然套取更多的外匯。進而論到「反復套取」，自然也是幣額愈多，所套愈多；因為我們在沒法假定在同一期間同一條件之下，貨幣數量愈少則其用轉勢必愈快的緣故。所謂「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在戰爭上確可決定勝負，我們不能以其僅係程度上之不同，而即漠然視之。

(五) 關於法幣膨脹和後方物價兩個問題，作者以為方面很多，現僅就其所討論的，只是：(1) 應不以法幣流往淪陷區域的辦法來解決法幣膨脹問題，和(2) 應不以同樣辦法來解決後方的物價飛騰問題。我以為僅憑這個辦法，最低限度是難收效的。因為法幣若能很自由的流入淪陷區域，則此區域便不是和後方完全隔離的地帶，苟非另發指令，禁止法幣倒流，那末，同樣的法幣既可流出，同樣的法幣也可流入，即使暫可收極效，將來亦必出入相抵，沒有實效。何況法幣為發行，權在中央，如果真有種種需要，而且力能做到的，則何以不追本溯源，膨脹時設法收回其一部，緊縮時再增發一些呢？次以物價高漲問題，方既以相同的價格尺度來互相流通，那末，淪陷區內若以法幣做物價購買，又焉知其不影響及於後方？此乃專

就法幣流通與物價的關係一點而言，如再進一步去認清了後方物價問題的癥結，是在游資囤積，那末，這種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的解決方案，更不難預卜其成效了。

(六) 准許法幣流往淪陷區域，以從事於生產與抗戰工作，自然是合舉國的期望。但有兩種困難：第一，所謂淪陷區域，在軍事上早已奉令改稱「遊擊戰區」，敵我雙方之軍政控制力量，常有變動。在那所謂「拉鋸」的情形之下，法幣被劫奪的可能性似乎很大。第二，法幣本身只是一種標碼，必須換成了別的東西——最主要的工具——才能發揮它的生產作用。現在敵方封鎖之下，淪陷區何從獲得它的生產工具？如果它不能從國外直接運入，豈非還需要由後方來供給？於此可見想解決淪陷區內的生產問題，其主要關鍵是在何處使它獲得生產工具，而似不在大量的予以法幣。且在「拉鋸」的狀況之下，生產工具即便已經獲得，其安置與保持，還有問題。

(七) 至「為防止敵偽套取外匯基金計，禁止法幣流往淪陷區域」同時，政府為救濟淪陷區之物資計，又使法幣大量流往淪陷區域，看起來似乎是很矛盾，其實，亦非沒有合理的辦法來使之解決。第一，我們可以法幣為準備，另發鈔券，只供國內使用，不准購買外匯。第二，我們可以有關於各省之貨幣來收購當地物資，而不使用法幣。最後而又最根本的解決辦法，當然是把外匯自由市場停閉——關於這點，下文還要提出。

除此七點以外，紀錄中尚有精確的限制原則，並談到了便利輸送與辦法問題。但是依照邏輯的常態發展，大前後的論據既有疑問，則由此推演而來的餘文，也不過是條件的修補而已。例如原文(乙)項中第一段會論及現在法幣和敵偽票券的牽連，使我們讀了以後是很害怕很痛心的！茲再摘錄申論如下，藉以證明法幣更不應讓流往淪陷區域：「現在敵偽票券實際上已與法幣互相牽連。法幣之跌落，敵偽票券之廢毀與其無外匯準備實為主要原因；我國為保持法幣之流通計，在貨幣缺乏之區域，不妨酌量補充，而在主要之商場，貨幣兌

換率最爲顯著之地，或以勿使兌換比率減低爲計」。

試問法幣與敵僑券，原是體系不同而又互相敵對的東西，怎麼會發生變通？而且法幣跌落的主要原因，怎麼還是由於敵僑券之漲與其幣外匯準備所致？據作者推測，其中原因似乎不出下列二者：第一個是敵僑或以法幣來套取外匯，並以之充發行券的備有準備；第二個是敵僑搜括了淪陷區域的大宗法幣，直接用做準備基金，間接用做操縱法幣幣值的工具。果爾則過去的措施已經失策，今後即便不加矯正，也不能再擔任法幣流入淪陷區域，致更加強敵僑鈔票的準備基礎，並雄厚其操縱法幣幣值的實力。因爲如果這樣下去，我們苟欲俾免「同胞受盡」，則除維持法幣以外，尚須擴大範圍，繼續維持敵僑鈔票去了！至對法幣缺乏之區域予以補充，在兌換率最爲顯著的商場，以勿使之減低爲計云云，實行似亦不易。在未發明隔離的方法以前，誰也不能保證貨幣缺乏的地方經過補充以後，它的法幣不會流到兌換率最顯著的商場上去！

再如「法幣不應禁其流往淪陷區域，但應繼續其流往國外」云云，這只能在理論上說說而已。因爲前方的區域或備，在經濟上實較後方爲繁榮，價格的禁止恐不可能。至於設有傀儡組織的淪陷區域，當地既有外商和敵人，法幣落在他們的手裏，照作用說，雖在國內不也等於國外嗎？

最後，我們既早准許各省銀行發行省鈔，爲什麼還要聽任法幣流往淪陷區域？

總而言之，我要淪陷區域，正如我愛法幣一樣！但因淪陷區內有敵僑和奸商，所以我對法幣不願隨便我所愛護的法幣，再對那裏提供野獸們的套匯和贖取。

但是這一重大決策，如經專家們，尤其是當局慎重研究之後，認爲非應法幣自由流往淪陷區不成（蓋有地名不能購買外匯和黨政軍費必需支付之法幣，當然除外），那末，我固不得已而必犧牲自己的主張，固也不忍不先提出兩個最重要的條件，希當局採納：

(一) 必須停止外匯自由市場；

(二) 劃定上海等埠爲非法幣區域；

這兩種硬性的措施，雖不能夠杜絕敵僑在其佔領區內對我法幣發生某些作用，但或能使我們的外匯不致被人套取。在現世界中依然維持外匯自由市場的國家，恐怕只有兩個：一爲舊有全世界黃金總額約百分之七十而尚未參加戰的美國；二爲素以缺乏金銀著稱而又經過了三年半的抗戰消耗以致不得不向英美借債的中國！這一點是要請大家注意的。

最近敵汪偽約之簽字，雖不一定大地震動了上海的金融地位，然而英美借款適於此時到手，則對國內五十餘萬萬游實的動感所可及於外匯自由市場的嚴重影響，似非沒有預先把握的必要。關於這些問題，我想當局和專家們一定會有穩妥的應付辦法，所以不再節外生枝，囑囑的儘請教了。

徵求同事

本社現需添聘同事一名，其主要工作爲抄寫。凡有關本刊之語力，使用毛筆之習慣，而又願學編輯與校對之技術者，皆可自撰五百字左右小傳一則，函達本刊主幹對美士先生處應徵。如對先生認爲滿意，當即覆函約期面談，決定名額，薪額及其他條件。因爲交通不便，凡距小龍坎過遠不能當日往返者，希勿應徵爲盼。

與排工論詩

本刊第七期第八頁所登小詩一節，原稿寫得非常清楚，校對時亦未見有什麼錯字，但在大排字以後，排工也許爲喝丁兩杯年酒，忽然詩興勃發，要幫鄭先生改起詩來。第三句原文「春自暗生人不覺」，改作「春自暗生人不覺」，頗有意思，因爲重慶冬天確實多雨，至少多霧，春來則天晴也。惟末句「江南人看嶺南春」，改作「我兩人看嶺南春」，不知有無典故。

大學教育上的一個嚴重問題

沙學濤

抗戰以前中學畢業生多數能夠考入大學；當時中學高三與大學一年級的課程大致可以銜接，所以沒有發生什麼問題。抗戰軍興以後，尤其自衛軍重心西遷以後，沿海各省許多大中學亦隨之西移，因播遷與戰亂關係，學生生活不能安定，圖書設備多不充實，以致學生程度進步很大；其中中學基礎多數不及大學，故所受影響較重，進步的速度亦不大。原在內地的中學，雖然完好如初，未受戰爭的影響，但因學生需英文及自然科學的程度原較沿海中學為低（有人說要低二年的程度，毫不確實），現在若與移入內地的沿海中學相較，或亦沒有多大差別。

因為一般中學生程度不遠戰前沿海中學，故大學中學間的銜接便發生了問題。抗戰以來各大學雖已降低了原有的嚴格入學標準，但多數中學生程度仍然不能趕上。大學每年必須招收定額的新生，自然不能一再降低其入學標準。此在公立大學統一招生及私立學校自行招生，都是一樣；只要看每個大學裏的新出，除一部分程度較好的以外，都在讀那「補習（一）」課程，便可知之。

抗戰以前，中學選就大學，設法適應大學的入學標準；中學辦得不善，畢業生便不能考入大學。抗戰以後，大學選就中學，設法適應中學生的畢業程度；如果要維持原有，甚至相當降低了的入學標準，便只能收到極少數的學生！

這種事實值得嚴重的注意，因為它的影響，極其深遠，摘要言之，有下列數端：

（一）大學多數新生所補習的英文，自然科學，甚至國文及社會科學等都是中學課程。大學生以四個學年的時間研究一種專門學問或職業，現在要消耗其中一部分的時間（約半年至一年半）去補習（一）中學課程，這對於專門學問的研究，自然是要發生重大的影響。

（二）大學是研究專門學術的地方，它不是中學，更不是中學的延

長，其空氣，其環境，其教學方法均與中學不同，所以並不適宜於代學生補習中學課程。優良的大學教授不一定是良好的中學課程的教師，然而至於是不好的中學課程的師資。因此，大學新生所補習的課程能否達到預期的目的，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據各方調查結果，它的弊病是反面的。

（三）以大學的教員與設備來教授，不，來補習（一）中學課程，實在是太不經濟。殺雞焉用牛刀，而況牛刀並不行！

（四）讓許多根基打得不好的，即是不配來受大學教育的學生來受大學教育，結果難望圓滿。這對於國家社會固然是浪費；對於受教的學生亦有許多不利。他們在受教的時候，對於許多學科常感心有餘而力不足，例如數理知識不夠的不能讀理工科，雖然對此有興趣有志願；又如英文不好，外國文參考書就讀不懂。此種新生約占全體新生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們在大學裏既未能相當的「德」學，離校就業或從事研究以後，自難要隨時感到學殖不深，能力不夠。在校雖努力，離校多傷感！

（五）學生學殖不深，能力不夠，不但在其所任工作上不能表現充分的數額，就是對於他的道德，行為和人生觀上亦有重大的不良影響。一個力不勝任的工作者，常因不易滿足其所懷抱的人生希望，而致悲觀消極；更因工作成績不如人，而致精神常感痛苦；這種人在道德上常無力能勝任的人容易發生問題。

（六）我們總希望我國的大學能夠提高程度，俾有一天能與歐美著名大學互相頡頏，甚且駕而上之；但我們年年存退步，在加速的落伍，如何得了！甚麼時候我國的學術才能獨立呢？

（七）抗戰期中的建國工作與抗戰結束後的建國工作，都是很重要的，都需要有充分訓練與堅實根柢的大學生去担負，去領導，去執行。

今後各大學所造就的青年，有幾分之幾能夠適應這種需要？

大學造就專門人才，與其匆匆忙忙造就十個「半行的」及「不行的」，不如延長時間造就一個「很行的」。兵貴精而不貴多，大學生是國家的文化戰士，既要多又要多，但二者不可得兼時，當然是應取「精」而舍「多」。多而不精是粗製濫造，絕非訓練專門人才所宜。訓練不好，不許起飛，大學生基礎不夠，亦不應讓他畢業！我國大學現在及今後，究竟是怎樣的呢？

抗戰前數年，國聯教育考察團對於中國的高等教育，曾有下列一段批評：

「中國大學教育之當前第一障礙，亦殊簡單，即入學之大學生，多屬缺乏適當之準備！由此所生之結果，極其嚴重。大學之程度及大專教育應具之整個觀念，於以低落。爲求學生數量之增加，遂不惜犧牲其品質（請讀者特別注意此語）。……而此輩學生，在知識上既無適當之準備，又無維持此種知識標準之能力。入學過易，就學生本身言，實爲有害而無益（請讀者特別記取此語）。蓋由此所引起之希望，從來常不能滿足，每每宜於從事實際事業之青年，亦被誘而入於學術研究」

已經到了最後大反攻的時候

一九四〇年業已過去，一九四一年開始來臨，在這抗戰剛步入第五個年頭的今日，我們所處各方面局勢，頗堪提出一個口號，就是：我們最後一個大反攻的時候已經到了！

上次歐洲大戰，其規模之大，戰爭之烈，在歷史上都可算得空前。但它自從一九一四年打起，到了一九一八年即告終結，屈指首尾不過四年。這一次的中日戰爭，參加的雖僅中日兩國，但到現在總算也已支離破碎第五個年頭了。五個年頭的戰爭，較之西洋史上的「百年戰爭」與「三十年戰爭」，時間上雖不能算很久，但以現代戰爭的殺人之多與摧殘之大而論，却都已夠一個國家的忍受。以我國的地大物博，人

究之途也。此種情形，對於國家公共福利之影響，其不幸亦復相同。

夫一國之需要，並不在於多數青年能入大學，而在於各種職業之人才，能有適當之分配。……中國大學中，自亦不乏備有適當之資格，善於領受大學教育之優秀學生。然就現狀而論，實有過多之青年，誤認列名於大學生之林，即不備有無上之榮耀。在過去之中國，學有傳統之優越地位，屬於有閒階級，得免勞力之操作，而在官吏任用，亦有特殊之機會，不意此種觀念，仍盤旋於今日學生之腦際。……青年一入大學即成爲特殊階級之一員，對於本國大衆生活茫然不知，屬於大衆生活之改進，毫無貢獻。

這是一個深刻而嚴峻的批評，除最後一語稍嫌過火外，大致都可接受。這個批評是在抗戰以前數年發表的；現在各大學學生程度及入學標準降低甚速，這個批評的正確性及重要性遂因而增高；對於它，我們實應更加重視。

從這個批評裏面，我們不難知道中國的大學應該怎樣的加以改進和改造。在大學改造完成之前，我們所講「提倡學術研究」和「努力研究科學」的口號，都是不易實現的。

孫時敏

口業多，支持這樣一個長期的戰爭已是不易，那末，素以資源貧乏人口不多著的敵國，其將更何以堪！敵國內閣所以每次到了更替的當兒，其新閣登台，總要高唱一下「早日結束中日事件」的口號，其最大原因，亦即在此。我們現在固不能機械地說：凡一切現代的大規模的戰爭打了四五年都得結束；但我們如肯張開眼睛，把周邊的情形仔細估量一下，却不能不很大胆的說：中日戰爭到了現在，在我們的一方，確已到了最後一個大反攻的時候了！

什麼時候最適合於我們最後一次的大反攻，事關軍機決策，最高統帥部自有權衡，本用不着我們來妄參末議。而今我們不揣冒昧，終於

提出了這樣的一項主張，這就需要我們先來表明一下自己所站的立場。第一，我們並不是像一般的敗北主義者那樣，對於這次戰爭根本上感到絕望，希望趕快結算一次綽賬，以自速其滅亡。第二，我們也不像那二黨瘋狂的敵國軍閥一樣，因為心切於求，目眩於視，焦急煩悶，走頭無路，乃舉動急賭徒，輕擲最後孤注。第三，我們也不像那一般神經衰弱的人一樣，因為對於這個長期的戰爭，早就感到不耐煩了，妄想即刻來決一個雌雄，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但欲求早弛解那種緊張的戰時空氣。我們之所以提出前述那種主張，就是開始大反攻的主張，乃是適量由於審察了各種客觀的有利條件，並且這因懷有必勝的信念。

我們就先放眼以觀當前的世界大勢。試問抗戰三年半來，客觀環境之對我方有利，孰有過於今日者？我們且不必說數年以來求之不得與英美二國之物質上的切實援助，現已接踵而至；而美國備戰之日益積極，英國態度之轉趨堅強，也都是些幾年以來從未見過的現象。他如美英遠東政策之日趨平行，美蘇關係的日益接近，亦皆足以促成暴日國際地位的愈趨孤立，並給它以一種莫大的壓力。更其重要的是：歐戰神風雖曾吹得暴日高張至於發狂的程度；三國同盟的締結，又曾使它得意至於忘形；然而曾幾何時，德國攻英之遭挫折，地中海形勢之起突變，義大利用兵希臘之慘敗，以及英國在北非反攻之得勝，竟使暴日的窮兇氣焰，不得不暫趨消沉。現在暴日要想拔起它在中國的泥腳，既不可得；恣意南進，又不可能。而其國內，論政治則舊政黨既悉被解散，大政翼贊會又獲得各方的擁護，議會早已形同虛設，憲政也驟歸無遺。近暫內閣除了一味仰承軍閥的鼻息以外，一點也沒有作為。最難能又勉強抬出一個明知無用的汪精衛來，承認其他偽組織，簽訂一束實質上等於廢紙的協約，以圖強自遮護；但其惹起的反響反祇有對日本更爲不利，故其不能振作民心也如故。論經濟則平準基金早已告罄，民間現金亦耗竭俱空，一大串天文數字的赤字公債既勢難再發，通貨尤難膨脹得可怕。加以連年歉收，食糧不足，米錢動已難見不鮮；而美禁運之結果，又使多數工廠感覺原料缺乏，不得不陷於停工。馴致本年度的預算，至今還是編不出來。且僑軍未已，歸鄉無期，民怨沸騰，勢所必至，其最後的總爆發，爲期當不在遠。

綜上所論，可見中日戰事正如一局圍棋，暴日所下的盡是死子，現在祇消它的對手輕輕地地下其最後一着，便可取勝全局了。這裏所謂最後一着，便是我們的大反攻了。

有人說：一個戰爭的結果，到底須取決於軍事上的實力，其他皆在其次；倘若一國軍事上準備不用，準備不足，實難下令進攻，雖有良好時機，絕妙環境，也不一定可得勝利。這話固然是有相當理由。但在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一個戰爭的結果，直接的決定因素固爲軍事，然而，時機的抉擇與環境的利用，往往比較軍事本身更有決定的作用。所以古今中外的善用兵者，莫不重視天時地利與人和。須知良好的時機與適當的環境，其本身都是力量——所謂「先發制人」與「以逸待勞」之類，完全是指這種力量的運用。敵人每次有所大舉，必擇歐美列強無暇東顧或於我國內亂災荒嚴重之時，其故似可深思！蓋兵雖常備而糧不可失。故曰「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千日之所經營，完全爲這一朝。我們今天是否等到了這一朝！我們豈必錯過這一朝？

猶憶少時看三國演義，中有一回講到周瑜裝病，諸葛亮替他開一風按，其詞曰：「欲破曹公，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如今我們斷斷抗日戰局，亦正不妨套用原詞，略加改觀，其詞如次：「欲破敵軍，須即反攻，萬事俱備，只欠心鬥」。現在我們祇要大家放棄私心，各對自己的同胞表示信任，不要互相觀望，對許我以，即在最高統帥的賢明指揮之下，不難趁着這個千載難逢的良好時機，趕快發動二次大規模的反攻，而將倭寇殺得片甲不留。

同胞們！環境是千變萬化的，時機是稍縱即逝的，我們必須善自選擇，才能一舉殲敵。誰能担保明年今日一定勝於今年今日？「凡今日可爲之事，勿待明日」，這是西洋人的一句格言。我們務要充分地利用今日！

注意：凡欲訂閱本刊者，務請逕與中國文化服務社接洽。

書報春秋

英國詩文研究集

費鑑照

方重著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民國廿八年四月初版 一元二角

本集共收論文七篇，小品文五篇。論文短論一篇，大約有三百頁左右。作者在序裏說：「我的親朋友，若仍把我當作親戚或友，請到這部集子，也許可以拿起來，翻一翻，笑一笑，如想起我這一個來，知道我還沒有拋棄我自已，並且讓他們知道我還在求上進」。這是帶有刊印本集時所抱的願望，據我看來，實在是太謙遜了。這裏所收來的論稿與小品文，多數在學問上，或在人生的意義上，都給我們許多有價值的啓示。第一篇，「十八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研究那一個時代英國文學作品中關於中國的地方和關於中國的傳說。我們讀了以後，便可知這一個遠在萬里之外的異族，當時對中國種種觀念。我知道有幾位在美國專攻英國文學的先生們曾經研究過這個題目，但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業已發表者似乎不多，也許還有一兩篇罷了。讀了本文以後，我們纔發現了過去所常忽略的地方，以及不曾知道的地方，增加了知識不少。

第二篇是講「英國小品文的演進與寫作」。對於此，須溯到那英國小品文的如何發展，也

給我們一個很清楚的概念。他寫這篇論文，一定是先讀了很多的原著，且費了不少的心思與時間，要不然，那能有這許多原始的貢獻？在史的演進方面，敘述可說圓滿，關於小品文的藝術，我卻嫌他寫得過於簡略了一些。中國現在很有人想寫作小品，但是寫出來的東西，往往不夠稱爲小品，甚且缺乏一點小品文所應具有的趣味。倘使作者接受我的請求，將來能夠補遺個缺憾，那末，對於在這方面力求發展的青年作者，或許會有很大的裨益。

在這一篇短評裏面，我不想對每篇文字作一個別的討論，而只願向讀者概括地說：這些文章一致保持著很高的標準，並不是提筆來隨便寫成的。作者所選的題材，雖是文學，却常著眼於人生和民族。例如他論那與白郎寧對於人生意義的解答的時候，便在結論中說：「這兩位英國民族中代表作家，對於我們！中國人或者可以以做一副『舊良劑』。因為他們兩位『都有智的膽量，愛正面觀感實際，最恨因循苟且，躲避困難』。這正是針對著中國人的通病。我相信經過了這一次長期的抗戰以後，中國人性在情上，

也許會有很大的改變，但若能把這兩位作家和作者的話，時常放在心頭，或更容易促進改變的遠度。作者對於人生的注意，不止表現於一處。他曾特別提出心靈的培養問題，便可視爲另一顯例。關於這個問題，他說聖徒和莎士比亞戲劇集兩書實是培養心靈的最好工具。關於聖經，中國已有很多人知道，不用說了。關於莎士比亞，知道的人實在太少；但是作者對於莎士比亞之能培養心靈，闡釋亦甚詳盡，此處無加補充之必要。我在這裏所說的話，乃是因爲他提出了這個問題，而使我復記憶起來的一件故事。大約是在抗戰發生後幾個月，有一個從天津遷移到漢口出版，而其銷數又是很大的報紙，竟在它的社論裏說：莎士比亞無神抗戰；我們用不着讀什麼莎士比亞！我不知道那位寫社論的高明記者，如果他曾經過了一番慎重考慮而後發這段「宏論」的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跟着那位老師，依據何種版本，讀過什麼莎士比亞。爲了保護它的獨立與自由，甚至生存，一個民族因應該軍經武，用以抵抗民族的侵略；但在同時它也不能忽略了精神上的鍛鍊與修養。在抗戰開始後不久，我們的最高領袖便喊出了「精神動員」，而今則前方與後方，人人都感覺到「精神食糧」的恐慌。所謂精神食糧的主要食庫，在中國自然是從四書五經以至有裨抗戰的各種社論，而在外國則無論如何挑選，誰也不能硬把莎士比亞的作品剔出。這本是題外之言，不必且不便多說，我相信真有思想的人，決不會持相反意見。

這本集子的最後一篇是用英文寫的，題名可譯「我們是否還需要文學」。在這歐亞兩洲同時受着激烈的狂風驟雨摧殘之中，作者的呼籲不會立刻發生作用。那些貪婪無厭的暴徒，爲了填滿自己的慾壑，放起了種種收拍的野火，心靈

上早已失掉平衡，行動上早已變成瘋子，作者却要他們各個人都去平心靜氣地讀那哥德奧但丁，事實上決不可能。等他們一敗塗地，亡命或被拘，無聊時候以閱讀爲消遣，看到那些先知先覺的作品，一旦恍然大悟，却又追悔作者的忠告，

沒有早些進入他們的耳朵！

無論是否看他的中文或英文著作，我們都感覺到作者對於文學，是有很豐富的修養和很深刻的了解。

二 惟名主義

朱東潤

這裏所說的惟名主義，不是西洋哲學中和惟食主義對立的一個派別，而是東方特有的一種精神，一種人生觀。

我們的教是「名教」，我們的前途是「功名」，我們的著作是「名山事業」，我們最大的期望是「功名顯赫」，我們最大的恐怖是「恐修名之不立」。我們的聖人說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樣看來我們是如何地沉浸在名的氛圍中間。

在這短短的人生旅途上，我們拚命地奔走。做官的要做名宦，名公；讀書的要做名流，名士；做娛樂事業的也要做名妓，名伶；總括一句就是要做名人。最不幸的便稱爲「無名小卒」，說得俏皮一些，也可稱爲「姓名不見於經傳」；受到這種品目以人，常常會感到太史公所說「白髮，嬰金鐵；毀肌膚，斷肢體」那樣的痛苦。世說：「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其實，管他第一流第二流，不妨由他們去說，因此氣急務獲，以致血液循環發生障礙，面如死灰，

真有些小機。但溫太真依然是個歷史的名人，對於他的編年，也少有人加以訛笑，因爲他正是個惟名主義的典型人物。

因爲要求名，自然有許多求名的方法。唐代的陳子昂，費了千金買一古琴，隨即當衆把它打爛，正在衆人奇聲嘆息的時候，他慨然地說：「把琴摔了，你們覺得可惜，爲什麼把我這樣的才子擱下，倒不覺得可惜呢？」其結果，陳子昂就此出了大名。幾年以前，上海一位專寫招牌匾對的書家，買通了漆匠司務，在他們遇到主顧光臨的時候，照例說：「爲什麼不請某人寫招牌呢？某人寫了一定生意興隆，利市三倍！」主顧的生意興隆與否，無從統計，但是這位書家却因此而得出名。

這個當然止算俗不傷雅，在惟名主義的立場上總還是可以容許的。但是時代的演變真快，到了現在，惟名主義已經得到更大的發展。陳子昂的求名，爲的是表彰自己的才能，上海書家的求名，爲的是滿足個人的欲望，但是現在的惟名主義，恰恰做足一個惟名字，除了名以外，什麼

都沒有；得到名以後，一切都完成。

約在五六月以前，樂山來了一大批學生，男的，女的，洋服，中裝的，塞滿了旅館和飯店。三兩天後，滿街發現了新標語，我纔知道這是什麼學校的遠征服務隊。標語也是形形色式，有圖畫，有美術字，還有許多類似國畫的字樣，一半吊得極高，一半落得很低，中間懸着二根根細線，好像有意揮扎的燈死鬼。標語的內容當然是有明文規定，無可非議。奇怪的是樂山也有若干中等以上的學校，標語人人會寫，那麼，又要勞動諸位遠征服務隊，爲的什麼？或許樂山的學生也到那個不很遠的地方去遠征了！那麼五台山的和尚要上西天，西天的和尚又要上五台山，正不妨走到半途，大家會心一笑，各歸原位，既省去了彼此的勞碌奔波，又減輕了最後必須交付交通費用的窮苦民衆之重負。但是這算什麼？「遠征服務」四個字怪好聽，我們就愛上了這個名字！

還在民國五年，就有人提倡大學救國論，其時的大學總數可數，這樣的提倡，當然有它的意義。後來大學雖是一年一年地增加，縱使在救國的方面，除開大學員生以外，一般大眾還摸不出什麼顯赫的成績，但是大學的內容，却在不斷

她改道。到了抗戰的前夕，幾所國立大學以及其他的大學總算走上軌道。戰爭一來，大家西遷，於是改組的改組，合併的合併，這當然是最合理的結果。可是經過了幾年的抗戰，在紛亂不安的狀態下面，中學生的素質降低了，連帶大學一年級生也受到了日形嚴重的影響，這是對於大學統一招生的成績稍加注意的人都曉得的。

就大學本身講，在圖書儀器方面，沒有一所西遷的學校不曾受到鉅大的損失，要添置沒有錢，有的錢也均無從添置。於是一切因陋就簡，維持現狀的人已覺是煞費苦心，回首前塵的人更不禁惘然若失。這是說的國立大學；在省立大學或私立大學方面，那更因為經費緊縮，尤其無從措手。但是正在這個無法進展的時候，我們還不斷地聽到籌改國立大學或是添辦省立大學的報導。教師的人才不夠，學生的學力不夠，時間不夠，經費不夠，這又是如何苦來？只爲了「提倡教育」四個字！

去年的夏天，成都的米價一天一天提高，一直貴到每石市價十一元了，於是省政府下令平價，勸令削低四分之一。這個命令當然和一切的命令一樣，也是雷厲風行，令出無犯。米舖子裏，上面掛着每石八元二角五分的招牌，下面安着盆底朝天的小斛。要買米呢，那裏對不起，請到羊官去打聽當日的行市，米舖子止願掛牌子，不賣米的事。樂山縣更好，壓根兒不賣米，只有背米米袋來販。掛牌子不賣米，祇得苦了縣政府施代。大街小巷販米了每石市價九元四角告示，縣街和公園旁邊却

坐滿了售價十三四元的米販。我祇可惜購了無數的白紙，也購了許多的新聞記者，睡夢顛倒地創造了米價低落的新聞。這是大致消麼？究竟有些不像。要是掩耳盜鈴麼？也真將心何忍。一切的一切，畢竟是惟名主義在那裏作祟。

囤積居奇固然不止糧食一項。在最近一年中，負着發展國內的金融，提倡後方生產使命的銀行界，也盡了不少的責任。單就樂山說：烏龍壩一帶前年還是一片平曠，去年堆積的木料便差不多和山一樣；從草鞋渡到李壩，十幾里的地帶，也全堆上木料，開了老幾十年來未見的眼界。這是一家赫赫有名的銀行的事業。他們掛上了木業公司的招牌，最近在這裏正在大登廣告，在他們的提倡之下，樂山的木料漲了五六倍的價格，木匠鋪裏嚷着買不到原料。另外一家銀行正以用年百分之一九。二的利率，拚命吸收存款。依着國民政府利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的規定，那麼，這家銀行要放單據放款營業的話，他們祇好坐在那裏喝風了。除非銀行界另有什麼秘密舉行的秘方，我們祇有擔心一切的標語和法令，都成爲惟名主義的例證。

一位朋友住在離此不遠，山嶺時隱的某省省會裏秋天他從那裏迢迢地來了，一番寒暄之後，我說：「報上講四川到你們那裏的公路通了，你這次想必是坐汽車來的，究竟少了許多辛苦。」那知道他皺了眉頭，告訴我，公路只是通而不通。這可怪了！事情是這樣的：在上級機關川令五申限期通車以後，路政當局眼見得沿路橋

架無法完成，只得放了一部卡車，滿載了木板，向前開車。經過豁澗的時候，便放下木板，臨時支架，等到空車從上面開過以後，再把木板拆下，仍舊裝上卡車，以便下次再用，經過這種架橋拆橋的手續，總算一路無事，到了那邊以後，電報傳來，果然如期完成，實行通車。這便是通而不通。我敬服這位路政當局，確實是位惟名主義的大師。他把事情這樣地區分，簡直無懈可擊，得到主義的神髓。

生產事業同樣地感到惟名主義的薰陶。一家造紙廠，萬水千山巴巴地從後方運到後方，到邊以後，空機器，招工人，忙得不亦樂乎，等到十分之九大器完成，偏偏在原料的方面，發生最大的挫折。原來這家工廠的原料是用破布的，要獲得生產的原頭，每天就得消耗二十噸破布。這個數放在別的省分和省會裏，本來供不應求，不成問題，到了四川，便完全改觀了。四川的破布全在貧苦大眾的身上；造紙固然重要，但是沒法把大眾羣身之具，脫下來交給紙槽。於是耗費成千成萬的工廠，祇得暫時停頓，等待收買破布以後再謀出路。這個不能怪誰，只有慨歎惟名主義下國，又添了一個犧牲者。

惟名主義在中國，是自古有之，於今益烈。不但在政治方面如此，即在學術方面，工商業方面，以及社會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因爲人類社會的生活，一切都和政治發生連繫，所以思想補救惟名主義的偏弊，我們便不能不對政治發生更大的期望。黨政工作考察委員會之於戰時成立，或許可使我們的期望早日實現。我

們希望它把各級黨政機關的一切宣言佈告，良法美意，彙訂成冊，隨時稽考，過有一項目名實難

離功德圓滿的時候，便在其下蓋上「允訖」之戳。這樣，不但可使所有的建國計劃，不都止於字裏行

間凝固了無邊的功業，而且在國民窮財盡之關頭，或能免除一些「架橋拆橋」式的無謂浪費。

九龍一年

植甫

在淞滬英陷後，我由上海到香港，預備到後方來，因為大病剛好不久，到了那裏，感覺天氣太好，宜於休息，便在九龍暫住，如是者過了一年。其時由上海租界上逃來的人物，已有形形色色之概：內中儘有自承「避地」的，亦有告辭人脫離人已向巡捕房指名要他的。但我則因那時已為破家失業之人，且就各項條件而言，均不備有宣傳何港地之資格，所以我在那裏，只不過是對於香港一時的繁榮，盡了一分的棉薄。

外江佬到香港以前，不能不考慮語言問題。有人說，英語可以通行無阻。有人說，筆談亦便。孰知均不盡然！英語只對一小部份的人有用，其餘不行。筆談麼？也很容易碰壁。因為粵人所說的俗話，有時且為異地之方言，而官話中之常用詞句，粵人亦常不能了解。粵語中所謂「我的」二字，其實即為「我等」之俗寫，所以外江佬必稱「的」為「之」，才能表達他的原意。曾經有一粵人一本正經地問我能讀白話文否，當他聽到了我的回答，很自然地表示他的羨慕！

已不可否認。按照港政府法律，凡在大香港出生者，應為殖民地屬民。不過英國人做事，照例是很放任的，如果出生時不去登記，或過相當時期之後不去補登登記，那末，「皇家殖民地」也不在乎損失這批反正教養不馴的人民。這在華僑觀之，可說「先得我心」，因為大家本是謀生而來，那些漢來調換「毫分」，發財後就回家立業，誰希罕這大英帝國的國籍！所以僑有已在香港住上了幾代，而尚不能算是僑民者。且因地理關係，得與家鄉時常往還，故無絲毫隔閡。即有少數知名紳士，事實上不得不辦階化手續，歸亦仍自命為華僑，故國之思久而彌篤。抗戰以後，旅港僑民，在事實上所表現的愛國情緒，誠可令人欽敬。我在香港雜詩中有一絕：

「百年屈指和戎策，十六燕京此處傷；見說人心猶未死，我來涕淚滿衣裳！」這是紀實之作。香港與九龍隔之，雖隔一海，然其寬度則與重慶至兩岸之間，相差無幾。渡口有好幾個，而以尖沙咀為最狹，來往最便，班次最密，所以人們都歡喜由此來去。我曾在過海時想起一聯，雖不工穩，略可形容當地情形：

自北自南，一衣帶水；
如兄如弟，四海同舟。

但是來往之各色人等，果真「如兄如弟」乎？過去是個謎，現在則已拆穿「西洋鏡」了。廣東人比較重於情感，最能精誠團結，「如兄如弟」之精神，在橋胸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女子亦然。聽說順德地方，過去常有一種違反人道的姊妹結合相約，同謀自立，不為人妻。香港有一處地方，名叫「十姊妹」的，傳說當年十姊妹中有一違約出嫁，其餘九人便同過那一人一齊蹈海，憤憤而死。地老天荒，這一良蹟的靈流，不知已到大洋中那一角落去了，然其遺跡之存留，永令憑弔者觸發無窮之感。此等姊妹，既有擺脫時家庭桎梏的志氣，自然易傑出者流，只可惜走錯了道路。

香港之英國屬地，將近百年，照道理說，歐化程度應該很深了，實則不然。除有少數地方十足歐化外，大部份的地方仍是保存着廣東風味——簡陋之處，不一而足。而在這些簡陋的角落裏，住的也不盡是窮人，頗有富商大賈。這些簡陋地方，要說始於齊齊清潔上不暇顧嗎？我不必為之辯護。要說是他們餓餓苦窮窮嗎？我想誰也不便否認。

至於九龍和香港山上的住宅區，則真是幽美之極，青山面海，紅綠相映，四時長春，鳥語花香。可惜如此環境，未能容納高人雅士。山上儘有豪華樓，而實門可羅雀，偶一踏進門去，只令人自疑誤入歐家！

香港者何？百年前是海外一個荒島，至今毗連之小塊，尚有不少未闢之地，舟行視之，宛若盆景中之石山。然在今日，則其為異國，實

我以爲兩國之可喜者，不是「一年無日不看花」，而是過年能見曬曬的燕子。久居北方的人，乍到此地，幾乎不辨秋多。至少，我是有這一種感覺。其時，人們多已無家可歸，對此依然可以來去自如的候鳥，當總有些「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緒。

當我留居南國的時候，行篋中又收進了幾粒紅豆。據說這種紅豆，在南洋羣島幾於俯拾即是，不結實則已，一結起來，柔弱者皆是。物以稀爲貴，多了就不甚覺可貴。今來白沙，聽說有一地稱紅豆樹，即因該處植有四株老不結子的紅豆樹而得名，朋友們無不讚於相思子之美名，紛紛前去尋問，而我則因已有此物故，猶借此二行。

所謂香港的名勝，自以淺水灣爲最著稱，但我覺得淺水灣的咖啡座等，遠不及茶居那極富於誘惑性。茶居處處皆是清靜，嗜飲者亦復不少，有的早晚兩市，無不兼顧點心，多者竟至二十餘種，花樣亦日日翻新。茶客都愛高聲談笑，笑語而坐，初去雖嫌嘈雜，久後亦能習而安之。實際上，當我離開九龍的時間，我只對於這些迷人的茶居，戀戀不捨。

通訊 沙坪壩消費合作社

編者：我是一個教書匠，平常三句不離本行，口講的是地理，筆地寫的是地理。來到重慶三年，頭兩年兩臨臨頭研究，努力寫作，但是到了最近一年，因爲受

着環境的壓迫，我不得不改行了。從前口講的是山川形勢，現在筆寫的是柴米油鹽，你看我今所選的題目，就知道我在忙些什麼了。

三年以來的重慶物價，無日不在高昇之中；從前是十一塊錢一担上白米，現在是一百八十塊錢一担次細米；從前是兩塊錢一挑的紅炭，現在要賣到九十塊錢一挑了。關於這此平定物價的問題，自有專門研究社會經濟的學者先生們在忙着策劃。至於我們的家庭經濟，入不敷出，開源不能，祇得節流，衣雖可節，食不能縮，柴米油鹽，因此還是未解決的問題。

還在二十九年初，政府就只通令各機關各學校分別組織消費合作社，藉以減除商人剝削，避免商人操縱。同時還聽到政府撥有巨款，設有專官，來負責推動合作事業。沙坪壩這個區域，住滿了不啻數千子，於是應聲而起，就組織了一個消費合作社。

當這合作社成立之初，社員不過一百五十人，社股不到六千元，租房子，買設備，開辦費花去一千多。營業開始，賣米賣煤，資金少即週轉不靈，商品缺則招徠不周，營業輕，利息微，開支太大，店員缺乏，政府方面，因主權機構尚未健全，不論資金商品，對合作社絲毫不加支撐，結果合作社之本身，奄奄垂危，絲毫不能發揮能力。此種沙坪壩消費合作社之暗淡時期。

入夏以來，重慶煤價驟升，合作社之煤棧竟被焚燬，損失在千元以上；繼與本社往來之某米廠，亦中途停止，本社資金被吳澤者又千餘金，社中情況，因而益感不支。後值秋收，重慶米

風潮大起，米價由三十元一石陡升至一百八十元一石，商人囤積，市米斷絕，政府鑒於事關之嚴重，立即發售平價米，除特設公賣處外，並委託市內消費合作社代爲發售，預購者以合作社社員抗戰家屬及貧寒居民爲限。自有平價米，合作社之業務，大爲開展，附近持戶及機關，因知合作社之利益，紛紛加入社員，登記社員由一百五十餘增至一千五百，社股資金，亦由原有之六千元增加至一萬五千元，社中營業，大見發達，餘利漸多，職員佈置亦漸見充實，是爲合作社之成長時期。

自十月而後，發售平價米之辦法另有改變，然本社之基礎則已確立，營業種類，日見增加，商品價格則見降低，社員對於社之興趣，大爲增加，社中營業之總額亦日見提高，同時各方對於社之贊助亦日增加，例如銀行之透支，商品之供給等等，在在予本社以莫大之助力，因果相循，遂構成了本社今日之繁榮。

以上略述沙坪壩消費合作社之創始與經過。本人忝居發起人之列，雖復備位理事，故於社務所知較多，因草此函，以告同志。消費合作社之組織，雖無當於經國大計，確亦關係民生之要策，小之可以解決個人生活，大之可以安定社會秩序，際此米珠薪桂，囤積成風之時，吾人爲求衣食之無缺，消費之低減，則合作社之組織，實不可不設，擴而大之，則民族國家之復興前途，有賴於合作機構者亦多，其望政府於此，總務加扶植，在野小民，受惠不淺！胡煥庭，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於警報中。

風潮大起，米價由三十元一石陡升至一百八十元一石，商人囤積，市米斷絕，政府鑒於事關之嚴重，立即發售平價米，除特設公賣處外，並委託市內消費合作社代爲發售，預購者以合作社社員抗戰家屬及貧寒居民爲限。自有平價米，合作社之業務，大爲開展，附近持戶及機關，因知合作社之利益，紛紛加入社員，登記社員由一百五十餘增至一千五百，社股資金，亦由原有之六千元增加至一萬五千元，社中營業，大見發達，餘利漸多，職員佈置亦漸見充實，是爲合作社之成長時期。